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年第2期
(总第13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



<http://acs.whhit.org>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Zhongguo Shehui Yuyanxue

中国 社会 语言 学

2009年第2期
(总第13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



<http://acs.whhit.org>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 年. 第 2 期: 总第 13 期/
高一虹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04-030250-9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社会语言学—中国—
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867 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版式设计 刘 艳

责任编辑 甘红娜
责任校对 甘红娜

封面设计 周 末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78 000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0250-00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9年第2期(总第13期)

主编:高一虹 副主编:陈瑞端 谷晓恒 邵朝阳 苏金智

论文

-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中国:借鉴与发展 田海龙 1
- 何谓“批评性语篇分析(CDA)”以及“批评”的跨文化理解?
Paul Chilton 10
- 中国语篇研究新问题:语言、空间和地域 Barbara Johnstone 25
- 语篇与危机沟通:石首事件的启示 赵芃 37
- 权力话语的语篇建构——以《中国日报》社论为例 刘立华 郭金英 48
- 缺失的英雄:英国电视片中的中国历史形象 曹青 傅道辛 60
- 认同与互动——汉语自然会话中的个体认同 李晓婷 78
- 半机构性话语中的他人修正——以汉语电视访谈为例 李梅 91
- 形象修复策略的公关性——影星莎朗·斯通的形象修复话语分析 黄小苹 104
- 农民工的语篇建构:认知隐语视角 唐斌 115
- 课堂话语中的职业认同:批评性语篇分析视角 刘熠 125
- 从先秦与晚清文本看女性身份的话语变迁
——一种谱系学的跨文化分析 胡美馨 吴宗杰 141
- “情感口述”中的当代女性身份 陈丽江 152

书评

- 《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述介 赵芃 162
- 《教师知识与课程话语——外语教学的批判话语研究》述介
韩春燕 朱春发 167

后记

171

致谢

172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No. 2, 2009 (Serial No.13)

Editor-in-Chief: GAO Yihong

Associate Editors-in-Chief: CHAN Shui Duen, GU Xiaoheng, SHAO Zhaoyang & SU Jinzhi

Articles

- Develop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a TIAN Hailong 1
-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at Can We Mean by "Critical"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ul Chilton 10
- New Questions for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Language, space and place Barbara Johnstone 25
- Discourse and Crisis Management: A case in Shishou City ZHAO Peng 37
-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nterpersonal rhetoric in editorials of *China Daily* LIU Lihua GUO Jinying 48
- Missing Heroes: Portraying Chinese history in British television CAO Qing FU Daoxin 60
-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Identity in Mandarin Chinese Conversation LI Xiaoting 78
- Other-Repair in Semi-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Chinese TV talk shows LI Mei 91
- Public Relations Oriented Nature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 A discursive analysis of movie star Sharon Stone's image restoration HUANG Xiaoping 104
-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Farm Workers: A cognitive metaphor perspective TANG Bin 115
-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Classroom Discourse: A CDA perspective LIU Yi 125
-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omen Discourse—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alogy HU Meixin WU Zongjie 141

Chinese Women's Identity Constructed in Female Oral Narrative of Love Experience	CHEN Lijiang	152
---	--------------	-----

Reviews

Tian, Hailong. 2009. <i>Discourse Studies: Categori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i>	ZHAO Peng	162
---	-----------	-----

Wu, Zongjie. 2005. <i>Teachers' Knowing in Curriculum Change: 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y of language teaching</i>	HAN Chunyan ZHU Chunfa	167
---	---------------------------	-----

Postscript

171

Acknowledgements

172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中国：借鉴与发展

田海龙

提 要： 批评性语篇分析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语篇这一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分析，揭示语言运用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关系，并希望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带来社会变化。源于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这种语篇分析方法近几年来在中国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从介绍性文章、会议主题和研究论文几个方面讨论中国学者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关注。文章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在中国的发展是其在被“再情景化”的过程，在研究课题上表现为既有理论上的探讨，如对“批评”的概念进行中西文化对比，也有实践上的研究，如研究语篇在管理、教育、旅游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参与、再现、构建作用。

关键词： 批评性语篇分析；理论思考；研究课题；中国社会

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语篇这一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分析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揭示语言运用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关系（如媒体报道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家与民众在话语权方面的不平等关系）。CDA在分析这些语篇的同时生产着自己的语篇，并希望以此来改变这些社会问题。不论被认为是一个语篇研究的视角，或是一个研究方法，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它继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之后20多年的发展中，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如Fairclough、Wodak、van Dijk、Chilton）的研究成果也介绍到中国，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1.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中国

从所收集的文献来看，关于批评性语篇分析较早的介绍文章是“批评语言学综述”（陈中竺，1995）。文章系统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哲学、语言学基础，对语言、语篇、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常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工具，以及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历程等等。这方面较早的著作有《互文性的批评视角》（Xin, 2000），在这本书中，作者分析了不同语体的文本，讨论了权力、意识形态和互文性的关系，介绍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原则和分析方法。在这之后，介绍和讨论CDA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如王晋军（2002）讨论批评性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辛斌（2002）讨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方法，戴炜华、高军（2002）评述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以及丁建新、廖益清（2001）、陈忠华、杨春苑、赵明炜（2002）以及田海龙（2006）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述评。陈丽江（2006）对国内29种期刊上涉及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发现

2001-2005年有39篇文章,占检索到的1995-2005年5月期间47篇文章的83%。我们在CNKI上检索以CDA为主题的文章,搜索到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发表的70篇文章。这样,1995-2009这15年间的前5年只有8篇相关文章发表,第二个5年有39篇,而第三个5年则上升到70篇。这些成倍增长的文章数量在一个方面说明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国内受到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

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关注也使它成为学术会议的一个议题。CDA在2004年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上成为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在2005年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广州)上也有许多学者宣读了运用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浙江大学在2005年和2007年举办了两次“话语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Fairclough以及Blommaert等国际著名语篇研究学者应邀参加。2006年,首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研讨会和“批评性语篇分析高级研讨班”在天津举行,Wodak, Chilton, Flowerdew等国外学者为研讨班学员进行了讲座,并和国内学者一起讨论如何在中国开展语篇研究的问题,讨论的议题包括:(1)当代中国的新兴社会群体及其话语;(2)政府与机构话语;(3)话语与社会身份的建构;(4)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中国媒体眼中的西方;(5)话语、思想、权势关系和社会变革(朱蕾 田海龙 2007)。之后在2007年和2009年又相继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研讨会^①。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些学术会议上的讨论,以及运用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在这些学术会议上的交流,进一步推动了批评性语篇分析在我国的深入开展,也壮大了我国批评性语篇分析研究的学术队伍。

在引进介绍CDA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展开一系列应用性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运用CDA的研究方法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如张延续(1998)运用批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从分类、情态等角度对美国一些新闻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分析,指出分类和情态是其将意识形态融入报道内容的主要形式。黄敏(2004)运用van Dijk的新闻话语结构理论,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方面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媒体关于闽渔民与台海巡人员发生冲突的报道进行分析,指出这两则报道不论在宏观结构还是在微观结构都利用语言固有的建构功能来建构对自己有利的社会事实,进而揭示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对话语的控制来传递对自己集团有利的意识形态意义。任芳(2002)研究中美新闻媒体关于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通过对两篇新闻报道中的标题、事件描述和反映评价三个部分的句式模型的分析,发现这两篇新闻报道不论对事件的描述和对双方形象的建构都有明显的倾向性,反映出两篇新闻报道的不同立场。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运用CDA的原则和方法来探索语篇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认为是国内批评性语篇研究的新动态(支永碧,2007)。例如,徐涛、张迈曾(2004)通过分析南开大学60周年校庆(1979)和北京大学80周年校庆(1999年)的校长讲话来观察高校机构身份的语篇再建构问题。文章根据Foucault的话语理论以及CDA关于语篇结构变化与社会结构变化紧密相连的观点,通过对这两个校长讲话在语体结构方面变化的历时分析,发现校长讲话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传统的“传达信息、宣传教育”到“传达信息、自我推销”的转变,揭示出在“促销文化”影响下,高校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单一教育机构,而是积极建构和推销自己,扮演着自我推销的角色。项蕴华、张迈曾(2005)以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下岗女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政府对下岗女工这一社会群体身份

的理论描述、媒体对其由国有企业职工、到下岗女工、到再就业的职业轨迹的报道以及下岗女工个人对其身份的叙事语篇的分析,发现这些语篇构建了下岗女工的多重身份,如政府理论描述的身份,媒体折射的身份,以及下岗女工本人叙事构建的身份。下岗女工身份的多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下岗女工这一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出现与消失的动态特征。下岗女工的社会身份远非限制其语言实践的、固定的社会范畴,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动态的、多重性的意义构建过程。田海龙(2004)根据语篇是社会实践的形式以及语篇再现社会实践这些话语理论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原则,对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中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病例报告进行分析,研究了这些在权力关系和社会团体利益和兴趣中产生的“非典”病例报告对抗击“非典”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他对所收集的2003年4月至5月间发布的30篇病例报告进行语体分析(genre analysis),重点观察这30篇病例报告语体结构在这一个月期间的变化,发现病例报告的语体结构在“语步”的变化方面非常明显,经常有新的“语步”增加进来、旧的“语步”删除出去。这些“语步”的变化直接导致信息的增减,如有的信息被删除,有的信息被增加。研究表明,增加的信息与病例报告生产者的利益兴趣一致,删除的信息则有悖于这些利益兴趣。病例报告语篇的生产者就是利用自己生产病例报告的权力,利用自己对“符号资本”的占有,运用病例报告语篇参与社会实践,使病例报告的发布成为控制“非典”疫情发展的一个有效措施。

2. 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思考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中国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起学者的深层次思考。起初,一些学者对如何在中国开展批评性语篇分析“颇感为难”,即使感到“大有可为”,也觉得应该“以西方语料和古代汉语语料为分析对象”(熊沐清,2001:19)。然而,更多的学者对CDA的研究方法给予认可,甚至对国外学者对CDA的质疑进行评论。例如,针对Stubbs(1997)和Widdowson(1995,1996)对CDA“客观性”、“可靠性”的质疑,辛斌(2004)从解释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些批评的原因。他认为,尽管西方传统解释学将人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历史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换言之,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所以,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而是正确的理解和适应这一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惟有偏见才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辛斌,2004)。

对CDA的思考,还涉及到如何在中国开展CDA研究这些关键问题,如有学者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展研究,没有理由追求CDA整体划一的潮流(Shi-xu,2007)。实际上,CDA产生于其倡导者对诸如种族歧视等西方社会现象的不满,以及他/她们改变这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实践。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亦不相同,语篇作为社会实践的形式也就不具备统一的模式,所以要在进行语篇研究也不宜完全照搬CDA的方法,而是需要“批判性”的接受CDA的批评视角,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开展语篇研究。正像Blommaert(2005:35-36)指出的那样,“没有理由将语篇的批评分析限制在高度集中、后现代、后工业化、高度符号化的第一世界社会。更没有理由认为对这样社会的描述可以当作模式被有效地用于理解当今世界的语篇,因为世界要比欧洲和美国大许多,

而且这个世界上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如何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批评性语篇分析研究,这是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例如,田海龙(2008)在对比分析Foucault话语理论和CDA的批评视角之后,提出在中国侧重研究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他分析了话语理论与CDA的联系和区别,认为话语理论不像CDA那样强调自身的研究导致社会变革,而是注重研究语篇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其批评视角宽而广,可比喻为几何学中大于 180° 小于 360° 的“优角”。与此不同,CDA不仅强调研究语篇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更注重实现其导致社会变革的政治使命,强调通过对语篇的批评分析带来社会变革,其目的明确而集中,批评视角非常尖锐,可比喻为大于 0° 小于 90° 的“锐角”。话语理论侧重揭示话语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整体作用以及权力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注重对具体的“原产语篇”进行文本分析,也不致力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CDA在对社会实践者的“原产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的同时,创造出自己的语篇,并以这种“再创语篇”参与社会实践,实现社会变革。与这两种批评视角不同,对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研究的批评视角可以比喻为大于 90° 小于 180° 的“钝角”。这种研究视角可以扬话语理论探索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之长,也可避其缺乏具体文本分析之短,同时还可取CDA通过文本分析研究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之长,避其政治使命之锋芒(参见田海龙,2008)。

提出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语篇社会功能的理论问题。一般认为(如在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社会因素(如性别、身份、阶级、年龄等)对人们使用的语言具有影响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人们使用的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社会因素。但是,对于语篇如何影响和控制具体交际事件中的社会因素以及这种控制如何造成特殊的后果,深入地研究还有待进行,即使有研究涉及语言对社会的影响,也多是集中在语言的一般性和抽象性功能方面(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研究)。van Dijk 2006年9月发现在谷歌搜索引擎上列有600个“语篇功能”的网址,但“语言功能”的网址却高达120,000多个,由此他指出对语篇功能性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形成系统性(van Dijk, 2008: 129)。语篇社会功能不同于语言功能,它更多的强调语篇在社会语境中的运用,强调语篇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功能,强调语篇对社会的反作用。语篇社会功能需要社会活动参与者主动进行语言选择来实施,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性别身份、而且包含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因素(参见田海龙 2009a)。

研究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对CDA在中国应用深层次思考的结果,也是CDA的原则、理论、视角和方法在中国被“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sation)”的结果。所谓“再情景化”简单来讲就是语篇被从一个社会语境提出(去情景化),然后应用到另一个社会语境之中。在这个语篇强行植入(colonising)到一个新语境时,它受到新语境中社会主体的抵制和修改(appropriating),其结果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形成新的语篇或语篇杂揉(参见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Fairclough, 2006; Urban, 1996; van Leeuwen, 2008)。例如,CDA作为一种强势语篇被介绍到中国的过程,实际上是它既强行植入又遭到抵制修改的过程。中国学者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考虑如何应用它的研究方法以及用它的研究方法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这个过程势必导致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新的研究理论的产

生，导致多种研究方法的对话共存。语篇社会功能研究这一“钝角”的语篇研究视角就是这样一种对话的产物。

3. 研究课题

对CDA在中国应用问题的思考促使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讨论CDA在中国的研究课题。理论方面，包括对“语篇”的再认识、对“批评”概念的中西文化对比、以及CDA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还可以包括从跨学科角度探索语篇与权力、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等问题。实践方面，应该涉及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语篇与媒体、语篇与管理、语篇与教育、语篇与旅游、语篇与商务活动等，重点研究语篇在这些领域中的参与、再现、构建作用。这些研究课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的研究方向，具有“指向性”，但在下面的讨论中仍结合现有的一些研究加以释义。

关于对“语篇”的再认识，一方面可以从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②的角度研究关于语篇的不同认识，以及围绕语篇这个概念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之争，进而探讨语言思想（language ideology）的问题。在对话篇这一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时，可以从翻译的视角探讨“语篇”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如英语“discourse”为什么翻译成“话语”、“语篇”、“篇章”？这些翻译体现着什么语言思想？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语篇研究的角度探索语篇的真正内涵，如把语篇视为社会实践的形式，既包括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书面的和口头的语言，也包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选择语言方式的规约。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交流对象、所在场合以及各自依托的机构在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活动、构建身份、再现事实，所有这些构成语篇的实质性内容。在这方面，田海龙（2009a）从英语discourse的概念出发讨论其不同的汉语译文，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语篇、语言、篇章、文本这些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对“批评”这个概念的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可以使我国进一步认识在我国运用CDA研究方法进行语篇研究的特点。“批评”作为一个术语，往往与一个学术学派紧密相连。例如，在《社会和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ural Sciences*）》（Smelser & Baltes, 2001）中，与批评相关的术语有：批评法律研究、批评心理学、批评种族理论、地理学中的批评现实主义、当代批评理论、法兰克福批评理论等等。在法兰克福批评理论的词条下，Bohman（2001）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批评理论。狭义的批评理论指从西方（欧洲）马克思传统发展而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这种批评理论旨在把人类从奴役他们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从广义上讲，任何阐释当代社会中压迫和统治问题的社会运动都可以被认为是批评。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批评，批评理论都是具有某种实践意图的社会研究方法。所以，Bohman（2001）指出，批评首先应该是一种联合各种研究并承担批评风险的综合性理论，其次批评应该具有实践的特征。CDA的批评传统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可以概括成三个含义：批评是对隐含意义的揭示，对自我的反思，对社会的改革（Locke, 2004）。以此为出发点，赵芃、田海龙（2008）从批评是对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探索以及批评是导致变革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详细讨论了批评在CDA中含义，进一步明确了CDA的批评特征。

“批评”在中国文化中与西方的批评思想不尽相同。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过：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自我检查反省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批评。在近代史中，尤其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批评与批判连在一起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至今使人心有余悸。这种文化背景使我们对批评的理解很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思想结合起来，因此在听到批评语篇分析这样的术语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敬而远之，而在听到“积极性语篇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之后便认为找到了可以替代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另一种语篇分析方法，甚至简单地认为运用积极性话语分析的方法便可以捕捉和分析那些鼓舞人、鼓励人的语篇。实际上，我们应该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批评”在语篇分析中的含义，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关于CDA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首先可以研究它与语篇分析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黄国文、徐珺（2006）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这方面还可研究CDA与社会语言学在批评视角方面的联系。Blommaert（2005:6）指出主流社会语言学具有批评的特征，而Fairclough（2000）则更直接的将CDA视为广义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实际上，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社会语境中的语言和通过语言研究社会生活”（Coupland & Jaworski, 1997:1）。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语言学与CDA一样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的反动。不论是变异社会语言学还是互动社会语言学，它们对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关注，都与主流语言学注重研究封闭的语言系统形成明显区别。在社会语境的语言交际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往往导致语言资源的分布不均，并使这种“不均”自然合理。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与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的关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隐含在这种“自然合理”背后的不均。而且，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选择的语言学（Coulmas, 2005），它认为语言选择是有意识的，是语言使用者为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主动做出的选择。田海龙、张迈曾（2007）对语言选择后现代性的讨论，如对语言使用者通过语言选择来调节自我以适应外部环境、展示自我以达到一定目的以及行使权力以为某个机构服务这些个案的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CDA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联系。

与理论方面的研究课题相比，实践方面CDA在中国的研究课题应该更多一些，以致无法一一列举。总体来讲，实践研究是根据CDA对语篇的理解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例如，研究语篇在旅游活动中的作用，一方面可以研究语篇建构旅游产业及游客经历的问题，如研究旅游组织者、游客、导游等旅游参与者的身份建构问题，以及景点、服务、交通这些旅游因素的语篇建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研究旅游语篇（如有关游客及旅游地的语篇）如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变化，如研究旅游如何建构起自身的语篇意义系统，即含有旅游自身特点的行为方式。田海龙（2009b）具体阐述了这两方面研究内容，并指出研究的落脚点是探索通过什么样的语篇策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不断出现，新的行为方式和管理模式不断涌现。一方面这些变化在语言层面留下痕迹，造成新的词汇和新的意义表达形式不断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卫星电视、无线通信、互联网）传播开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着新兴的社会现象，规范着新兴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为批评性语篇分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潜在的要求。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在决策之前都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如2007年国家发改委取消五一长假方

案、2008年国务院的医疗改革方案都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民众的意见。一些媒体(如《北京周报》)还开辟了专栏讨论取消五一长假方案。这实际上形成了两种语篇的对话:一方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案公布方,一方是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民众,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方案公布方可以借助掌握的主流媒体宣传其主张(李静、田海龙,2009),民众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自己的主张,包括借助一些现代传播技术(如博客、短信)发表自己的看法。主流语篇与非主流语篇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权力关系如何作用其中?现代传播技术的作用程度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语篇在讨论和解决社会问题中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研究语篇如何再现和建构社会变革,研究语篇本身的变化如何带动或者制约社会变化,应该成为CDA原则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的语篇研究的新课题。

4. 结语

批评性语篇分析注重通过对语篇这一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分析来揭示语言运用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关系;在分析这些语篇的同时CDA生产着自己的语篇,并希望以此来改变社会问题并带来社会变革。在CDA将语言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赋予语言学更强的社会学意义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制度、各种文化背景中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也促使中国的学者思考如何在借鉴这种产生于西方的语篇研究视角时更好的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其理论,丰富其研究方法。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不断出现的社会变化是批评性语篇分析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甚至研究理论产生的沃土,中西方研究方法的对话与共存也将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附 注

- ① 关于“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会议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其网站:<http://sfl.tjcu.edu.cn/ndcc/>。
- ② 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概念语义的历史变化以及围绕这些变化展开的斗争来考察历史的发展。可参见Koselleck 1985。

参考文献

- 陈丽江 2006 中国的批评语言学研究综观,《外语教学》第6期,31-35页。
- 陈忠华、杨春苑、赵明炜 2002 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外语学刊》第1期,82-86页。
- 陈中竺 1995 批评语言学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21-27页。
- 戴炜华、高军 2002 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外国语》第6期,42-48页。
- 丁建新、廖益清 2001 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当代语言学》第4期,305-310页。
- 黄国文、徐珏 2006 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0期,1-6页。
- 黄敏 2004 “新闻作为话语”——新闻话语分析的一个实例,《新闻大学》2004春,27-34页。
- 李静、田海龙 2009 节假日调整方案调查问卷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天津商业大学学报》第2期,20-23页。
- 任芳 2002 新闻语篇句式模型的批评性分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19-23页。
- 田海龙 2004 病历报告: 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 《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113-124页。
- 田海龙 2006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 《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 40-474页。
- 田海龙 2008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339-344页。
- 田海龙 2009a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田海龙 2009b 旅游研究的语篇视角, 《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 124-128页。
- 田海龙、张迈曾 2007 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特征, 《外语学刊》第6期, 8-13页。
- 王晋军 2002 CDA与SFL关系分析, 《山东外语教学》第6期, 101-103页。
- 项蕴华、张迈曾 2005 下岗女工身份建构的叙事分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第3期, 154-158页。
- 辛 斌 2002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 《外国语》第6期, 34-41页。
- 辛 斌 2004 批评性语篇分析: 问题与讨论, 《外国语》第5期, 64-69页。
- 熊沐清 2001 话语分析的整合性研究构想,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15-19页。
- 徐涛、张迈曾 2004 高等教育话语的新变迁 —— 机构身份再构建的跨学科研究,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 107-109页。
- 张延续 1998 批评话语分析与大众语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24-27页。
- 支永碧 2007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新动态,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 27-32页。
- 赵芃、田海龙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 《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 143-147页。
- 朱蕾、田海龙 2007 话语与当今中国社会变革, 《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124-128页。
-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hman, J. 2001. Critical Theory: Frankfurt School. In Smelser, Neil J. and Baltes, Paul B.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ural Sciences*. UK: Elsevier Science Ltd. Vol. 5, pp. 2986-90.
- Chouliaraki, L. and Fairclough, N.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oulmas, F. 2005.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Speakers' Cho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upland, N. and Jaworski, A. (eds.). 1997.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London: Macmillan.
- Fairclough, N. 2000. Discours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f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 2000: 163-195.
-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oselleck, R. 1985.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by Keith Trib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Locke, T.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 Shi-xu. (ed). 2007. *Discourse as Cultural Struggl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melser, Neil J. and Baltes, Paul B. (Editors-in-Chief) 2001.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ural Sciences*. UK: Elsevier Science Ltd.
- Stubbs, 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DA. In M.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02–218.
- Urban, G. 1996. Entextualisation, Replication, and Power. In Silverstein, M. and Urban, G. (eds.). *Natural Histories of Discourse*.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 A.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Leeuwen, T. 2008.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ddowson, H.G.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review. In M.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1–147.
- Widdowson, H.G. 1996. Reply to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n M.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56–169.
- Xin, B. 2000. *Intertextuality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Develop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a

TIAN Hailong

Abstract Applying linguistic methodolog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studies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demystifying ideology and power in language use and attempting to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by its discourse practice. This western (mainly European) school has recently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Reviewing this attention in terms of introductory articles, conference themes and research papers,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CDA in China is a kind of its “re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a, being coloniz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ppropriated. It is then argued that dialogue is necessary that can fur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issues like comparison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cri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in such social domains as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tourism.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etical meditation; research topics; Chinese society

(田海龙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at Can We Mean by “Critical”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ul Chilto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 academic exchang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and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come to the fore.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hen intellectual movements that develop in one culture are taken up in another.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cross-cultural topics that arise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 made by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Chinese scholars share the approach known a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terms discourse and analysis but is principally concerned with what it means to be “critical”. The English term critical and the Chinese *pipi* are conventionally used as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exactly coterminous. Using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semantics, it is argued that the terms hav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histories—both etymological histories and histories of use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ossibility that critical evokes a different set of associations for English academic readers than *pipi* does for Chinese readers. If this is the case, there is a further serious issue, namely the issue of cultural relativit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both the concept and the practice of criticism (or critique) is sharable in the two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e paper proceeds to put a case for the universal potential of criticism as an intellectual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 by drawing on the arguments of the German philosopher, Jürgen Habermas. The following ideas are proposed for further debate: that all speakers in all human societies always make potentially criticisable claims, that the potential for critical challenge varies depending o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at when speakers make challenges the natural assumption is for resolution by “dialogue oriented to understanding”.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ulture; Haberma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movement and exchange of money, goods and people but also the movement and exchange of ideas. Among these ideas are academic ideas—that is,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None of

these can be isolated from interaction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s that they encounter that is with the societies and cultures which they enter. Among these conceptual flows is 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scale of human ideas over historical time, CDA scholarship may be a minor trend. Though it appeared in the academies of Western Europe and has spread to continents that use European languages, it would not be true to say that Chinese scholars did not have their own scholarly tradition of linguistic. However, the kind of discourse analysis represented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CDA has become known among Chinese scholars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and potentially brings with it conceptual frames and values characteristic of its origins.

In this article I shall look at each of the term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 aim will both to clarify my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as European (primarily English-speaking) scholars have understood them and to rais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m. For CDA, as currently practised in the European academy cannot and should not remain static. Several ideas connected with CDA need to be re-examined. Because CDA is now a focus of interest for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the aim is to make availabl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studying CDA in a Chinese context. Such an opening up will inevitably raise the question of the values that are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with CDA. Are they universal or are they culture-relative? This kind of question is best seen as initiating dialogue rather than offering a definitive answer. I shall, however, outline a way in which CDA might return more explicitly to one of its philosophical sources—Critical Theory (Frankfurt School), in particular its later exponent Jürgen Habermas—and in the process suggest one sense (not necessarily all senses) in which CDA is intrinsically universal in its outlook. The key issue here will be the core assumptions of the English word *critical*.^①

1. The term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 term *discourse* appears in several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rends in academic English. Linguists (and also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cognitive scientists seeking to make formal models of human language) use the term to designate linguistic structures larger than the sent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real-world referents.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coherence between sentences, for example anaphora. Sociologists (and also some literature specialists and some philosophers) use the term, oft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ucault, to refer to relative stable ways not only of using language but also of conceiving the world and evaluating it. CDA scholars incline to the latter sense, but often use the tools of linguistic description developed for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ons beyond the sentence. For example, CDA scholars are interested in how discourse cohesion is maintained by linkage with value systems (including ideology) and with the referents of personal pronouns (e.g., first-person plural pronouns). However, many sociologists use the term *discourse* without describing linguistic structures at all (as Foucault himself tended to do). In this latter sense, it is possible to speak, for example, of bureaucratic discourses, the discourse of education,